

最幸福的时刻

郭九岭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晚十一点三十分至零点三十分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北京赴郑州参加郑州会议途中，专列停在新乡火车站，在专列上接见了地委和专署的领导同志及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各县县委书记，我是《豫北日报》编委，有幸随同地委书记陈东升同志一起，受到了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并且还握住了他那伟大而温柔的手，聆听着领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和亲切的口吻重复着：“啊，你叫郭九岭，郭——九——岭”。

好 季 节

传 喜 讯

今年成千上万的农民上山奔赴钢铁工地，轰轰烈烈大战红十月，在地委大院里，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少数人中悄悄传递着：“听说最近中央领导同志要来河南视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内心思忖着：是谁来呢？莫非我们英明领袖毛主席再来河南？如果真是毛主席的话，很有可能再来新乡，他老人家曾在八月七日视察了新乡县刚刚成立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时过一两个月，新乡地区（当时新乡、安阳两地区合署）所辖的二十八个县、市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如今，全区数十万英雄儿女上山奔赴钢

铁工地，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白不休、夜不停大战红十月，再放一个大“卫星”，这个月已炼铁二百八十四万吨，一个月完成全年任务的十九倍，主席他不来看看吗？他的办公室主任田家英同志已在十几天前就来到七里营公社作农村情况调查，他能不向主席汇报？主席听了这大好消息也会来呀！毛主席啊！我们多么盼望您老人家再来呀！能见到毛主席，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可是又一想，毛主席就是来了，我作为报社的一名普通干部，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吗？我的心七上八下疑惑不定。可要见毛主席的美好憧憬一直鼓舞着我。一天地委一位负责同志悄悄对我说：“九岭，把照相机准备好，最近有客人来参观哩！”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沸腾了，心想：准是毛主席要来，即便不是主席来，是少奇同志或周总理来，我能见见也好啊！几天来，心里昼夜翻腾着，睡觉也不安生。一天夜里，忽听有人叫我：“九岭，快起来，到车站迎接毛主席！”我呼地坐起来，睁眼一看，哪有人？天还黑乎乎的，夜色深沉。原来是“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果 真 主 席 来 了

红十月的最后一天下午，正是我值班的时间，我看到地委常委院内人来人往，有的脚步匆忙，有的神色紧张，从常委会议室里进进出出，地委办公室副主任靳承斌同志拿着一沓材料，慌忙从会议室出来，我迎上前去：“靳主任，有啥好消息？这样失机慌忙！”“保密！”，说罢笑了笑，忙向办公室走去。我想：“准是主席要来呀，看情况是作准

备。”俗话说，“过去的人会算，如今的人会看”，我一看这情景，心里捉摸了一阵，似乎有了谱，我就留意观察。临黑时分，我见地委的车将田家英主任从七里营接了回来，我想：十有九准是主席来了，不然，为啥将田主任接回来呢？田主任到七里营调查，一般不回地委的，将他接回，说明主席要来。

这天下午我一边值班，一边留心观察。不到五点，便将稿子发往工厂。我匆匆吃了点饭，站在大院观看，恰巧，这夜是我到工厂值夜班。夜幕降临，下弦月已爬上屋顶，银白色月光洒满大地，八点时分，突然传来主席已到新乡车站的消息。怎么办？去工厂值班？不能见主席，去车站又怕影响看报纸的清样，值班编辑不看清样不签字，报纸不能复印，我心里很着急，于是赶紧跑到印刷厂，对西屋值班同志说：“你们先看清样，仔细点，我晚会再来。”说罢我便拔腿跑出工厂，一个劲往车站跑。路上，不时有小车来往奔驰，在路上我碰到几位地委部长，也失急慌忙往车站跑，因消息突然，他们连车也没顾上要，我们几个跑哇，跑！有的老同志累得喘粗气，我们又跑了一阵，一个个气喘嘘嘘，满头大汗。离车站还有一里多路，心里越急，越跑不动，不知谁说了一句：

“慢点跑，截车吧！”这时，在通往车站的路上小车进进出出，川流不息，于是我站在路旁，见车就摆手，恰巧，一辆小车“吱”一声停下了，原来是地委的车，司机说：“正找你们几个，在哪儿也找不到”。我们急忙坐上车，“快”！小车箭一般地向车站驶去。车到站，被保卫人员挡住不能进，怎么解释也不行。当然，我们理解保卫人员的责任：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啊！我们在站口停着，心急火燎，正当心神不安的

等着时，见刘东升书记从北边走来，我们喊了他一声，他见是我们几个，便向保卫人员说明情况，才让我们进去。这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得到了见主席的机会。进站一看，离主席的专列还很远，站内又不让汽车行驶，我们几个都手拉着手，又是一阵好跑，嘴里不住点的喘着粗气，可谁也不觉累。到专列前一看，想见主席的人黑黑压压一大片，足有几十人，一打听，得知主席正在车上开会，听取地委领导和修武县委书记张洋芹同志汇报，我们才放下心来。

站台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人们都呆着一张张激动、兴奋、期待的脸，沉浸在美好而幸福的憧憬里。

大家静静的等候，忘记了逝去的时间。忽然，主席办公室主任田家英站在车厢门口说：“同志们，主席的会议尚未开完，主席要我给大家说开完会一定会见大家”。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等候主席”！大家激情地酝酿开了：

“主席真是抓住了我们的心，怕我们等的时间长了心里着急，太关心我们了！”不大一会儿田主任又传下话来：“同志们，会还在开着。主席说天气太冷，在风口站着容易感冒，要大家到站房休息，主席答应一定要接见大家，还要跟大家一起照个像！”等候的人们沸腾了：“英明的领袖啊，多么关心人民的健康，我们生长在这位伟大主席的时代，够幸福的了！”一听说跟主席合影，年青的小伙子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上车去见主席的时候

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迎接主席的人越来越多，主席来新乡的消息本来是要绝对保密的，不准外传，这是纪律，谁知人们都咋知道的呀！这时，站台上等候主席的人估计有

二百多，时间已到二十三点，又扯起了西北风，寒气逼人，车站上的阔叶树，经风一吹，落叶随风飘舞，只有松柏和冬青挺立着，好象也在盼主席的会见。不知怎么，大家开始担心起来：主席这次路过新乡，天气这样冷，主席能下车吗？这么多人排成队，就是只跟主席握握手，也要几个小时啊，主席的身体怎么能受得了！这时，省委副书记史向生同志与耿其昌同志突然出现在专列门口，史书记说：“老耿，人太多呀！车厢容不下，主席还要赶路，来代表吧”！耿书记看了看人群，只好同意。耿其昌同志向大家说：“同志们，主席原来说接见大家，可是天气太冷，又到深夜，罗部长（罗瑞卿）和滕部长（滕代远）商量，主席就不下车了，在车上接见大家，可是人太多，不能都上车”，让谁上车呢，耿书记最后决定各县第一书记和地委委员上车见主席。听到点着名的同志眉开眼笑，连蹦带跳地跑上车去。我只是报社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该不着啊。这时我急得直冒汗！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地委副书记刘东升同志从车上下来，我迎面走去，他用手向我点了一下，我知道这是批准我上车了，他小声说：“九岭，你快搀陈书记去”。我心中猛地跳了一下，呵！觉着头忽的大了起来，眼也发黑了，竟楞在那里不知咋办了。一阵冷风吹来，我清醒了些，定了定神，便搀着陈东升书记一个劲向车厢跑去。

来到主席的车厢里

被批准见主席的人，一个个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主席车厢办公室里，车厢里一会站满了人，估计有四五十个。车厢的一头是寝室，一头是办公室。办公室里桌橙摆得整整齐齐

齐，地毯暄腾腾的，走过去一点声音也听不到，灯光亮得象白天一样。车厢有良好的隔音设备，一进来，车厢外边的欢笑声便听不见了，就连火车驶过的隆隆声也只能少微听到。

主席由史向生书记和耿其昌书记陪同，站在办公室的北头。因我们是由南门上去的，自然就站在主席面前了。主席红润的脸上发出微微的笑容，满头黑发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明亮的光。主席穿着灰色的制服，黑面白底布鞋。他那高大而健康的身躯多么魁梧啊！我的一只眼睛有病，视力极弱，就用力瞪大两只眼睛，直盯着主席。主席慈祥地对我们发笑。主席显得很年轻，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的样子，红光满面，连一条皱纹也没有。主席这样健康，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幸福啊！我那高兴的心情不知怎样才好，心通！通直跳，要不是肚皮挡着，恐怕要跳出来了。史书记站在主席右边，面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开始，我一个一个给主席介绍。”

“这是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同志。林县是山区。”

“呵！山区，大概你们那里很苦吧？山多么？”主席问。

“不苦了，在党的领导下，面貌改变咧。”杨贵回答主席的问话。

大家悄声议论：“主席真关心山区人民的生活啊！”一个个被感动得出神。

“这是清丰县的张振海同志。”耿书记接着介绍。

“呵！清丰县。清丰、南乐过去属直隶，你们是河北人哪！”主席边笑边说。

“这是内黄县的杨树勋同志。”

“‘内黄’是哪两个字？”主席问。

“内外的内，黄河的黄。”耿书记解释。

“呵！内黄。有‘内黄’，有‘外黄’么？”主席这一问，把大家逗笑了。大家刚上车时的紧张心情，被主席的风趣的问话吹到九霄云外了。只听耿书记答道：“只有内黄，没有外黄。”“没有‘外行’哪来的‘内行’哇！”大家又一次被逗笑了。

“这是濮阳县的王惠民同志。”

“濮阳很大。现在还有北门没有？”主席握着王惠民同志的手问。我们心里惊奇，主席莫非去过濮阳？

接着耿书记把原阳县魏书记介绍给主席。主席说：“原阳这个地方过去很苦，临黄河。”

魏书记说：“是。那已经是过去了，现在不苦了。”主席问：“社员整天劳动，能睡好吗？”“能睡好，只是睡不够。”“睡觉也要分配任务呀！睡不够不行。睡得好觉，生产效率才能提高哇！”主席面向大家说。

当耿书记将七里营党委书记田秀青介绍给主席时，主席紧握着老田的手说：“我们认识，请你代我向群众问好。”田秀青激动地说：“请主席有机会再到七里营察看察看，大家很想念主席。”主席微笑着说：“你给大家说，这次没时间了，有机会再看望大家。你那里有食堂吗？”“有”老田激动地回答。主席问：“食堂能垮不能？”田秀青说：“垮不了，很巩固。”主席又说：“垮了行不？”田秀青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主席接着说：“垮不了就要办好，要方便群众。让大家吃上热饭。你们那里群众一天能休息多长时间？”“五六个小时。”田秀青回答。“要让大家休息好。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有劳有逸。”

当封丘县委书记韩洪绪被介绍给主席时，耿书记对主席

说：“他是封丘县委书记，是《一个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作者。”主席说：“你立了功。办好合作社不容易哟。”

当我握住毛主席手的时候

耿书记一个挨一个地向主席介绍着，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我前面只有三个人了，这时我的心狂跳起来。照相机不停的拍照，闪光灯闪个不停，使我的心更加紧张起来。突然想起来一会就要给主席握手了，手凉不凉呢？双手互摸了一下，真凉呢！总不能让主席握我冰凉手哇！咋办呢？只能临阵磨枪了，双手急搓起来。谁知越紧张，手越凉。我索性解开衣扣将双手伸进内衣，紧贴在胸口上。见了主席该说啥呢？为什么不提前想好呢？埋怨自己也没有用了，我已经站到了主席面前。我握住了毛主席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想仔细看一看主席，可是眼睛蒙上一层雾气，临时想好的几句话也说不出，来，“呵”了两声后才说出：“我是报社郭九岭。”只听见主席重复地说道：“噢，郭——九——岭”郭——九——岭！”我紧握了几下主席的手，站到主席的右边，等待着陈东升书记给主席谈话。这时，我幸福的泪水淌了下来。一个钟头过去了，我们下了车，已是十一月一日零点三十分了，大家站在站台上，眼睛仍盯着主席的车厢，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幸福里。

回味幸福难入眠

回到工厂，已是午夜，值班的七、八位同志一见我，一个劲埋怨找不到我，“干什么去咧，找遍机关找不到，”我一说“受毛主席接见了”，大家不仅不埋怨反而要我介绍主席的

情况，我简要作了介绍，忙着看报纸清样，待报纸复印后，我便回到机关。可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心想：在我二十七岁的时候见到了主席，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毛主席是帮我们拔穷根安富苗的恩人，是六亿人民的福星。我将永远紧跟毛主席，把主席的指示变为现实，用工作成绩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1958年11月1日晨6时

写于宿舍

编者注：这篇纪实文章，情感挚烈，真实地表现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文章写于“大跃进”年代，文风与语言无不打有时代的烙印——惟其如此，方见其真。

作者郭九岭同志当时任《豫北日报》编委兼农村组长，现为南乐县政协党组书记统战部长。

浣 溪 沙

——赠南乐

刘镜西

抗战艰辛四冬春。

四十八载记犹新。

生死与共情最深。

南乐人民斗志勇。

杀敌卫国有奇勋。

民族大战殊可钦。

戊辰年五月

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捕经过

魏锡嘏

1926年我考入北京国立工业大学（后改为北平大学工学院），不久就参加了一个进步组织叫“共进社”。由王亦华直接领导，王是法政大学俄文系的学生（后改为北平大学政法学院），因王是濮阳人，所以参加该组织的多是大名各县的大学生，如政法大学的郭师典、李步庭（濮阳人）马星拱（大名人）、李鸾声（南乐人）、中国大学的姚瑜（大名人）、师范大学的刘士驹（清丰人）。

“共进社”是属于国民党外围组织还是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我不清楚。学习材料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共产主义A、B、以及陈公博、戴传贤的言论小册子。它的行动：宣传北伐、迎接北伐。就是1927年北伐军到南乐前我和李调元在家组建平民学校作地下工作时，是受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大名师范的几位共产党员的领导。看情况“共进社”可能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1927年暑假，北伐军右路梁寿凯部曾到南乐，住了三五天，即以战略关系南退了。

因为京汉铁路沿线有战事，北京各大学都推迟了开学日期，我于旧历八月节后才回北京。

大约是九月上旬，组织上决定来一次大的行动，全城同时贴标语，大造北伐的气势。当时预定某日早某时全城统一行动，不料东城区有少数人竟提前行动了，这样被当局军警发

觉了，作了全城警戒部署，致使学生多人被捕，我就是这样被捕的。

我按规定的时间，在天刚蒙蒙亮时，带着标语，浆糊由祖家街出发，街上行人稀少，沿着北沟沿一路向南贴起。贴了一段路发现有人在居民门口注意了我。我提高警惕步伐加快了些，门口那人径直向我走来，我走快他也走快。我感觉事情不妙，撒腿跑起来。这一带大街小巷我是熟悉的，很快进了阔才胡同，不远有一公厕，我把标语、浆糊向粪池一丢，证据没有了，心情轻松了，心想你总不能无凭无证来抓行人，于是急转几道胡同之后，大摇大摆口中哼着时代歌曲，沿深篦子胡同直向二龙坑走去。不禁暗笑：便衣们！警探们！你们岂奈我何！

可惜高兴得太早了。

中国大学的姚瑜就住在二龙坑皮库胡同一家公寓里。他房间隔壁住一位中大学生，广东人姓寥，过去我去姚瑜那里常和寥相遇有点头之交。

我想在姚瑜那里歇歇脚，吃早饭。当我一进门就有人拦住了。

问：“你找谁？”找姚先生”我回答。这时屋里另一服务员大声说：“你找寥先生？”“寥”字特别清晰，同时用眼神向我示意。但这时我却失去警惕，说“姚先生”，“姚”字也很清楚。门口人说：“你找姚先生？”我说：“是”，“是”字一出口，我就醒悟过来，但已迟了，那人接着问我姓什么，他说姚先生刚迁我那里不久，并交待我们如果魏先生来了，请他一定到我公寓来。我故作镇静向他解释说：“找他没事，我和他是同乡同学，我刚从老家来，顺便看看他，

西单有我个亲戚，我要到西单去，请你转告姚先生，以后有时间我去看他”。那人非让我跟他去不可，看样子如不去，可能动武，明知事情糟了，只得随他出门而去。

路上，我想口袋里有几十块准备交学费的现洋，同他拉个背场，“贿赂”他一下，把我放了。又转念一想：如果他不受，那不更糟了？给自己反而增加了罪证。想到这里，我把心一横，随他去吧！无非是嫌疑犯。

走到二龙坑右二区警察分局，那人用手一指说：“姚先生就在这里，进去吧！”就这样，我被捕了，原来姚瑜先一天被捕，那人是卧底的便衣警探。

在右二区呆了一天没吃东西，把我饿得眼发黑。直到深夜，用汽车等将被捕的三十多人（多是学生），送到北京警察厅监禁所。

当天午夜后开始审判，审判厅很大，是个像座礼堂、饭厅类的大屋，空荡荡的，前半部是黑洞洞的，只在审判台近处才有灯，左右摆些刑具：老虎橙、铁链子、夹板、杠子……虽说没有旧社会喊堂的吆喝声，但阴森的气氛也足使人毛骨悚然，高台上座着五、六位审判人员都戴着墨镜，凶相怕人。

简单地问了我姓名、学校、籍贯和姚瑜的关系，至于犯罪的事实当然得不到什么。接着每个被捕人员都照一张像片好查你的一切。坐监四个月只经过两次这样的审问。

因我们行动不一致，使统治当局做好了事先部署，造成多人被捕，警察厅监狱，一时暴满，无法容纳，三间房竟住了四十多人，监守人员昼夜值班，看管极严，不准说话，不准看书，每个人的位置都用名牌挂到墙上，白天只能在自己位置上坐着，入夜须按名单次序一颠一倒的睡觉，免得两人头

近接耳。为消磨时间，人们就练就一种特技用自己的头发，
拴自己身上捉到的虱子，一根头发能拴一串虱子，开展竞赛，
真是苦中寻乐，别有一番情趣。

终因抓不到证据，于旧年关由我的校方，俱保释放。

清 平 乐

——赠清丰

刘镜西

四十八载，
常梦故乡游，
卫水秋风古中州，
隋唐时代源流。

霁云将军故里，
沧海桑田春秋，
盛世年丰人寿，
美哉家园顿丘。

戊辰年五月

中国共产党早期直南地区 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安明

谷相乾

安明（1906——1989），原名刘介凤、刘大风，河南省南乐县近德固乡佛善村人，出身农民家庭。

安明幼年就读于本村私塾，1923年考入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简称大名七师）。大名七师是直南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二十年代早期，由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创建，1926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大名七师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冲击了封建落后的教育制度，开创了直南教育新局面；大名七师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在直南地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被誉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大名七师是进步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菌集的地方，校长谢台臣（河南省长垣县人），教务主任晁哲甫（河南省清丰县人）训育主任王振华（河南省南乐县人）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安明是大名七师早期学生。与谢台臣等人既是师生关系，且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在他们的薰陶和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罢工工人顾正红，导致“五卅”爱国反帝运动暴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形成全国规模反帝浪潮。在“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中，安明思想进步，旗帜鲜明地投入罢课斗争，是大名七师参与罢课斗争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之一。

1926年10月，安明由一个进步青年学生逐步成长为一个马列主义者，经大名七师英语教师冯品毅（中共党员，河南省团委书记）介绍和学友赵纪彬、李大山三人同时入党，成为大名七师和南直地区几个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

1926年底，安明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深入到革命知识分子和苦难沉重的农民群众中去，积极发展党员和从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首先在大名七师南乐籍进步学生中间发展了李渭川、朱智先、石仙洲等人入党；寒假期间，他利用回家度假的有利时机，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北伐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极力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农村中去。此间，他首先发展他的原籍南乐县佛善村先进分子刘峰入党，继而在该村组建了直南第一个党的基层农村支部（当时南乐县隶属河北省），点燃了直南革命的星星之火。

1927年春，安明同志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期间，安明同志被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营，直接参与保卫武汉城防和在部队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是年七月上旬，安明结束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由武汉返回，顺直省委决定他仍回直南从事党的工作。安明同志自武汉带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等革命理论书籍并将这些经典著作阐明的革命理论，巧妙地同当地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对指导直南一带的农民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九月，由大名、南乐、清丰和濮阳四县组成的大名中心县委成立，安明任大名中心县委书记。

北伐革命失败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直南一带的

革命活动遭受挫折，大名中心县委机关转移驻南乐县佛善村安明家中，大名中心县委为教育农民和改造地主武装，决定由安明同志利用乡土关系打入活动在南乐县西一带的红枪会组织“蟠桃会”。安明同志在家乡享有一定威望，被推选为“蟠桃会”会长。“蟠桃会”有成员200余人，是当时党组织凭借的一支有生力量。安明同志还以他“蟠桃会”会长的特殊身份与邻近红枪会组织主动发展横向联系，公开传播马列主义，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发动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安明同志直接领导下，曾在县委机关驻地——佛善村发动了一次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当权派算公帐的活动。几经反复说理斗争，农民群众取得胜利，使一百户500余人分得了钱财和粮食，维护了贫苦农民的利益。

1929年四、五月间，安明同志出席顺直省委在邢台郭庄召开的直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由陈谭秋同志传达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会议精神。会议还决定，撤销原大名中心县委，同时成立由邢台、南宫、巨鹿、南和、任县、肥乡、磁县、大名和大名以南之南乐、清丰、濮阳诸县组成的邢台中心县委。安明改任邢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1930年河北省代表郝玉峰奉命组建冀南特委，安明改任特委组织部长兼磁县县委书记，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安明同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他亲自组织并参加了著名的磁县暴动，同年，安明奉命以直南特委代表身份来南乐组织农民暴动。安明曾在南乐东街戏楼根饭店主持召开了学校党团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南乐一高校长李调元和学生积极分

子陈梓、姚喜兆、徐西昆、彭儒等人。会议由安明同志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组织农民暴动的指示精神并做了南乐农民暴动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安排。暴动的打击目标是南乐县民团总局、南乐县政府、南乐县公安局等要害部门。此次农民暴动虽出于某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但却是农民运动与学生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大胆尝试。

1933年2月，安明同志奉党的指示，深入六河沟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继续坚持革命斗争。5月，在组织煤矿工人罢工中被捕。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出狱，出狱后调任濮阳中心县委书记。此间，安明同志对建立和发展直南一带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坚持武装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人民群众中享有一定威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仓皇南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整个华北。“不当亡国奴，坚持华北抗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冀南特委接上级党组织指示：要迅速恢复与大名以南各县党组织的联系……并要利用各方面关系，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建立与扩大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负责冀南、予北党的工作的朱端同志（八路军派驻国民党第一战区代表）责成冀南特委张玺同志转告安明负责开展这一工作。

1937年10月下旬，大名沦陷，国民党专员马润昌弃职南逃，国民党181师石友三部退驻南乐县城西一带，安明乘机同我党派驻181师搞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学兵队长张克威、教官袁也烈取得联系，就直南组建抗日武装事宜同石友三进行谈判。谈判结果，石友三同意给一个“181师游击队”的称号，不提供枪支、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10月底，直南第一支地方抗日武装“181师游击队”在南乐县